

清代全史

第二卷





国防大学 2 063 7231 6

清代全史

第二卷

本卷主编 王戎笙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清代全史

Qingdai Quanshi

·第二卷·

王戎笙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68,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1/32}$ 印张: $15^{7/8}$ 插页: 5

印数: 2,672—7,671

1991年7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3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彻 高虹 丁建新 责任校对: 刘亚杰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延今

ISBN 7-205-01594-4/K·153

定价: 18.00元

前言

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60年代初便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由于十年动乱被迫中止。十年动乱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写一部1000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定了规划。经过反复讨论，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纂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编纂规划。这个规划的要点是，自1983年起到1990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以8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十卷本的《清代全史》（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20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清代全史》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小组。第一卷主编李洵、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喻松青、张小洪，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恽汝成，第九卷主编徐彻、董守义，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目

的在于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相学习、互相砥砺的过程，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袁国琨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王戎笙

1990年7月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由辽宁人民出版社资助出版。

项目负责人	王戎笙
本卷主编	王戎笙
本卷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戎笙	刘子扬
吴伯娅	陈祖武
何龄修	赵云田
顾 诚	秦 晖
郭松义	徐明德
黄 谷	赫治清
薛瑞录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清朝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13
第一节 明朝的覆亡与全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13
第二节 山海关之战和清朝入主中原	28
第三节 在清军打击下大顺、大西政权的相继覆亡	43
第四节 清初民族压迫政策和满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59
第二章 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	75
第一节 南明弘光政权与“联虏剿寇”政策的失败	75
第二节 隆武、浙东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92
第三节 永历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116
第四节 孙可望“国主”政权与抗清运动第三次高潮	130
第五节 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	152
第六节 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	163
第三章 清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及各项政策	178
第一节 清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178
第二节 对汉族官僚地主的控制与笼络	195
第三节 对蒙藏等族的控制与笼络	210
第四节 清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它所采取的措施	224
第四章 清初的统一大业	236
第一节 三藩割据势力的形成	236
第二节 三藩之乱	244
第三节 平藩战争的胜利	255

第四节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	269
第五章 清初的政治制度.....	286
第一节 中央行政机构.....	286
第二节 地方行政机构.....	301
第三节 兵 制.....	314
第四节 刑 法.....	325
第五节 财政制度.....	337
第六节 学校和科举制度.....	353
第六章 中外关系.....	363
第一节 中俄关系.....	363
第二节 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交往.....	375
第三节 中国与亚洲诸国.....	388
第四节 传教士来华和西方文化的输入.....	396
第七章 清初的思想文化.....	422
第一节 清初学术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	422
第二节 清初的主要思想家及其成就.....	438
第三节 清初的史学.....	468
第四节 清初的文学.....	484
第五节 清初的艺术.....	495
后记	503

绪 论

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大体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而也为英国建立世界工商业霸权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资产阶级就用暴力并辅之以其他手段，在亚洲、非洲、美洲广泛进行殖民扩张。明末清初，中国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国际形势。

对华武装侵略，明末已在沿海发生。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接着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葡、西、荷、英是当时称霸海上的西方强国。他们倚仗先进的海上交通工具和铸造精良的火枪火炮，在亚洲、非洲、美洲土著部落中，创造一系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和令人股栗的恐怖世界。可是在中国，当时的明王朝虽已腐败没落，但仍享有文明古国的声威。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农业和手工业，科学和技术，造船、航海、冶金等都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这些新崛起的殖民势力，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比中国强盛，当然没有把握战胜这个文明古国，当然也不敢象对待土著部落那样肆无忌惮。当初葡萄牙人居留澳门是要向中国政府缴纳租银的，虽然为数甚少，但毕竟表明主权属于中国，暂时还不敢攫为己有。

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主要是从菲律宾来福建贸易，限制在漳厦地区，规模也不大，但冲突时常发生，而且发生了大规模

惨杀华人的事件。

16世纪末，荷兰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跃居世界首位，它的殖民势力在亚洲是最强大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和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舰队两次侵入澎湖并攻掠福建沿海，均为中国军队逐出。以后侵占台湾，在台湾实行了38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为郑成功逐出。

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将约翰·韦德尔（John Weddell）率领船舰在未获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自行进入珠江，与虎门炮台守军发生三次战斗。

正当葡、西、荷、英等国的船舰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时候，在北方，沙俄在征服西伯利亚汗之后，急速地向东推进。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达鄂霍次克海。崇祯十六年（1643年）哥萨克头目波雅克夫（V. D. Poiarkov）率领百余人侵入精奇里江，抢劫杀掠。这伙吃人恶魔，在中国领土上无恶不作，遭到我国黑龙江地区居民的誓死抵抗。这伙入侵者不抱任何商业或传教的目的，甚至也不需要这样的伪装。他们一开始就以狰狞面目出现，屠杀、抢劫、吃人肉，扩张领土的狂热使他们敢于冒险犯难。顺治七年（1650年），哈巴罗夫（Erofei Pavlovich Khabarov）率领两百余人，带着以武力相威胁的致清朝皇帝的信，并攻占了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哈巴罗夫的后继者斯捷潘诺夫，（Stepanov）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深入松花江下游。这仅仅是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领土的序幕。

这是清初面临的国际形势。这样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欧洲人到中国虽从唐初就开始了，但在新航路发现以前，欧亚交通不便，来华者只有少数传奇式的人物，或献身宗教事业的布道者，或追逐高额利润的商人，或在好奇心驱使下的旅行家。他们不使用武力，也不以武力相威胁，没有领

主野心，没有蔑视或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对中国的稳定和安全不构成危害。但是，16世纪以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采用种种血腥手段，实行罪恶的原始积累。在国内，迫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雇佣工人。在海外，实行殖民掠夺，对殖民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掠夺人口，搜刮资源，垄断市场。西方列强的贪婪目光，正注视着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国。

当时国防尖端技术主要是造船、航海、冶铁、火药，而这几项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在16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遥遥领先的。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程之远，复航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海上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能相比。而且远洋航行必不可少的几项关键技术如指南针、水密隔舱，控制航向的转舵，都是中国发明并传入欧洲的，对欧洲的航海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惜自郑和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停滞甚至倒退了。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对付东南海疆的敌人，采取了时松时紧的禁海政策，有时竟至“无许片帆入海”。这种消极防御战略延续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两代，朝野上下均无海权观念，政府正严厉禁止民间海外通商，不许建造大型海船，禁止远洋航行，扼杀了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万里海疆实际上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执政者长期没有觉察到这种落后的危险性。在那海上争霸、弱肉强食的时代，有海无

防给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每个民族不分大小，在发展祖国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在保卫祖国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保障领土完整、抵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中，都作出了自己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是由少数民族贵族掌握全国统治权的朝代。有清一代，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甚至这种政治敏感性一直保持到清亡以后很久都未消失。能否较为妥善地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是清朝中央政府对全国实现有效而稳定的统治的关键。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影响当时，而且影响后世。成功的民族政策将惠及后世，错误的民族政策将遗患无穷。这是当时的政治家和今天的历史学家都能了解的。如果民族政策不能促进各民族间和睦互助，而是导致兄弟民族间互相残杀，清政府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国家就不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甚至可能导致分裂。在清代的历史上，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共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历史，也有过各族劳动人民联合反对共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历史。无可讳言，各兄弟民族之间，也有矛盾冲突以至武装对抗的历史。清代历史上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所利用，以实现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有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由他们蓄谋制造的。这就使清代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了。

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存在着阶级压迫的社会条件下，民族压迫是伴随着阶级压迫而产生的。有阶级压迫就会有民族压

迫。但是民族矛盾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历史上存在着民族斗争，这是客观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也是不能用阶级斗争替换的。民族斗争，说到底，它还是民族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取代民族斗争，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历史，尤其是清代的历史。

明代后期政治腐败，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加剧的同时，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也加剧了民族压迫，因而激起了女真人的不满和反抗。随着女真各部逐步统一和日渐强盛，对明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抗也日趋激烈。民族对立加剧，双方竞至兵刃相见。战端既开，胜负未分之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没有限制的。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战火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广。满洲贵族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多次率兵深入汉族人民聚居地区，大肆掠夺财物，掳人为奴。战争逐渐丧失了反抗明朝政府民族压迫的性质，而转化成为掠夺性的战争。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朝反动统治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清军乘隙入关，战火从长城内外延烧到大江南北以至全国。满洲贵族所进行的战争，完全丧失了正义性。入关后的战争，是入关前掠夺战争的继续。为了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汉族军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几十年前，满族曾是明朝政府民族压迫政策的受害者。现在，满洲贵族在夺取全国统治权的过程中，加剧地推行民族压迫政策。

满洲贵族为了酬赏效命疆场的八旗官兵，以“东来诸公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连续三次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以满足旗人的土地要求。同时，用投充、掳掠和赏赐人口等办法解决“耕地牧马诸役”的劳动人手问题，用严酷的缉捕逃人法以巩固对劳动人手的占有。圈占的土地并不限于上谕所说无主

荒地 and 前明勋戚皇庄，而是大量的民间田土，其中包括汉族地主的土地。清初这一大弊政，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被圈地之家，含着满腔悲愤离开祖坟、故居、良田，远走他乡。虽有所谓“拨补”，但都在数百里之外，而且是贫瘠之地，既无房屋口粮，又无农具种子。不但难以继续生产，甚至难以继续生存。圈占的后果是大片土地荒废，肥沃的良田水冲沙压，不堪耕种。尤其严重的是使大量汉族土地所有者失去产业，流徙他乡，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圈占土地引起的另一结果是，拥有良田沃土的旗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从关外带来的奴隶不足以役使耕种，于是诱骗胁迫汉人投充旗下为奴。这些投充为奴的汉人，多半是近畿一带圈地的受害者。土地房屋被圈占，又无力转徙他乡，只有投充一途。也有少数刁顽之徒，带地投充，倚仗旗人庇护免赋免役，甚或横行乡里。此外，八旗士兵还抢掠汉人为奴，或汉人犯罪判归旗下为奴，或“价买”人口为奴。圈占土地引起了连锁反应。连锁反应的一个恶果是奴隶制的一度复活，而奴隶多系汉人。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这些奴隶本是有自由身份的农民或城镇居民，突然沦为任人凌辱驱使的奴隶，自然是要拚死反抗的。当时反抗的方式主要是逃亡。清政府为了对付奴隶逃亡，制定了极为严酷的缉捕逃人法。奴隶是旗人的财富，所以逃人法惩治的重点不在逃人而在窝逃者。所谓窝逃，并不限于窝藏逃人。凡误雇逃人作工，误留逃人住宿，误收逃人为兵，几乎与逃人稍有牵连的都算窝逃。告发窝逃者有重赏，知情不举者受重罚。查解逃人多寡，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于是冤假诬控层出不穷。对这种政策的讥议或谏诤，都是严厉禁止的。逃人法的受害者是汉人，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当清军占领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之后，自以为取天下唾手可得，伪装和掩饰都不需要了，毫不留情地屠杀一切敢于抵抗的汉族军民，甚至屠杀一切没有公开表示降服的汉族军民。降服的标识就是剃发易服。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与不剃，变成生和死的选择，而且必须在令到之日起十天内作出选择，迟疑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对汉民族来说，在民族感情上，在伦理道德上，在风俗礼仪上，都感到是难以容忍的伤害。于是为了捍卫本民族的尊严、气节、礼俗、文化传统，展开了悲壮的搏斗。“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头可断，发不可剃”。汉民族中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宁可在屠刀下悲壮地死去。剃发易服激起的民族仇恨，比圈地、投充、逃人法更广泛，也更强烈。它打击的是千千万万，而不只是某些地区、某些集团或某些阶层。它不仅强烈地伤害了民族感情，而且大规模地制造血腥恐怖。这一系列错误政策，不仅破坏民族和睦，而且妨碍国家统一。在民族对立如此严重的状况下，只可能导致更大的分裂，而不可能有国家的统一。

满洲贵族的政治目标，并不是为了宣泄民族仇恨，而是要夺取全国范围的统治权。他们未尝不知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古训，但他们实行的暴虐政策激起了广泛的反抗，而且又是以不足百万的少数对付数以亿计的多数，“不嗜杀”的古训也顾不得了，因此对不愿屈从在铁蹄下的任何人都绝不宽容。但同时他们也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对全国的统治的，特别是实现稳定而有效的统治。运筹帷幄需要经验丰富如范文程一类的汉官，统率三军需要有能征惯战如洪承畴一类的汉将，冲锋陷阵需要几十万汉族士兵，宣扬伦理纲常需要有熟悉儒家经典的汉族文人，树艺五谷需要有千百万有生产

经验的汉族农民，搬迁更无需要有善于经营的汉族商人。这一切，都是建立全国政治统治绝不可少的，但又不是用血腥的办法可以获得的。正因如此，甚至在以军事征服为主的顺治初年，也未尝忽视从政治上征服人心。征服对象首先是汉族官僚和文人，征服人心的第一招是打出“吊民伐罪”、“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为崇祯帝发丧，令天下臣民缟素三日。这就使那些讲究君臣之义的汉族官僚和文人要感恩图报了。此举征服人心之力，实不可以低估。清政府这一招还给一些剃发易服的官僚士大夫们送上了一块遮羞布，向“为我先皇帝复君父之仇”的王者之师输诚纳款是符合春秋大义的。此外，针对广大下层群众，清廷还有赡养鳏寡孤独、减免钱粮徭役、蠲免一切加派的许诺，以及应允礼俗衣冠暂从明制等等，都是入关之初征服人心的政治设计。

剃发易服是表示铁蹄下屈从的标识，也是全国统治权是否已经夺得的外部标识。经过一场腥风血雨之后，汉族军民大规模武装反抗已在悲壮声中结束，被迫接受了辮发和旗服，也就是接受了满州贵族的政治统治。

当军事征服已在广大地区取得“留头不留发”的明显效果时，随即采取相应措施，医治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主要是用怀柔政策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激烈对抗。

首先争取汉族上层分子合作，并与之分享政权。对明朝文臣武将，诱以高官，授以大权，示以重用。这是入关前行之有效的政策，一大批汉族文武官员为新朝创基立业奉献了自己的忠诚。入关之后，更放手地推行这种政策，只要为新朝奉献忠诚，便可重用。甚至倚为心腹，待如上宾，给人以满汉一体的假象。清军南下并席卷江南，主要是驱策洪承畴、吴三桂、孔

有德等一批汉将率领几十万汉族军人参与“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屠杀，既强化了武力征服，也淡化了满汉畛域。利用这批汉将出面招抚笼络汉族官员，更有奇效。清代中央政府中实行满汉双轨制，虽然实质上是重满轻汉，但在外观上是满汉分享政权。顺治二年，开科取士，仍沿明代旧制，使汉族文人兢兢于仕宦之途。康熙帝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君主，亲政之后曾大幅度地调整民族政策，特别注意调整满汉关系的政策，努力消除20年腥风血雨所造成的满汉间的严重对抗。康熙十二年（1673年）颁谕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十七年（1678年）特设博学鸿词科，吸收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素有名望的汉族文人。十八年（1679年）又开明史馆，收罗汉族文人编纂明代历史。三十八年（1699年）以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的纂辑。这一系列措施，成效显著。一时名儒硕彦，网罗几尽。

消除满汉间敌对的关键，是按汉族地区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皇帝在这方面是有远见卓识的。他深知圈占田地是严重侵犯汉民族利益的一大弊政，亲政之后，于康熙八年断然谕令户部永远停止圈地。他还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统一台湾后，又及时解除迁海令。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上谕中常用“安民”、“安静”、“宽民”、“宽大”、“不扰”等语表述他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思想。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谓与民休息，从主体上说，就是使广大汉族地区的居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形成了百余年的盛世局面。广大汉族地区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大致都继承和发展了，而且带入关内的原来满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也都汉化了。旗地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